

《文明碎片——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书评

王文轶^{1,2}

(1.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2.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文明碎片——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一书承载着对辽金王朝的追忆和契丹、女真民族历史的往昔,是一部治东北辽金史学的重要资料性宏著。

关键词:文明碎片;遗迹;遗物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15)02-0065-04

2013年9月,王禹浪、都永浩先生主编的《文明碎片——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后文简称《文明碎片》)一书,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对学术前辈的成果向来不敢妄自褒贬,但《文明碎片》一书,确实是多年来学术界从事辽、金、契丹、女真历史和考古研究不可多得的一部详实的工具性著作,堪为治东北辽金史学的案头顾问,值得向学界推介。

一、《文明碎片》一书的作者与基本内容

《文明碎片》的两位编著者是我国从事东北边疆史、东北古代民族史以及民族学与民族理论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本不必加以介绍。但是一部著作的编撰往往与编撰者的研究领域、学术素养和学术经历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可以说《文明碎片》的编撰与出版,既离不开两位学者长期学术研究的积累,也凝结了他们对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的深刻思考。

两位先生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东北大地眷怀着拳拳赤子之情。王禹浪先生从事东北边疆史研究40余年,是我国东北边疆史领域的著名专家。他长期专注于东北边疆民族、考古、历史地理等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辽金史、高句丽史、渤海史领域的研究成果甚多,可谓著作等身。在其出版的20余部著作中,有《金源文化研究》、《神秘的东北历史与文化》、《东北古代史研究》、《近三十年东北古代史研究目录》、《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东北辽代古城研究汇编》、《金源文物图籍》、《金代铜镜》、《金源古印辑存》等多部具有学术研究与资料价值的代表性著作。都永浩先生是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历史研究领域著名专家,并曾长期担任核心学术期刊的主编,学术扎实,文字功底深厚。由其作为主编的《黑水世居民族文化丛书》、《黑龙江流域文明丛书》中,也不乏具有资料与研究价值的著述。从两位著者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来看,辽、金、契丹、女真的历史是两位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具有合作研究的学术基础和共同的民族史学的视野。同时,两

位先生均注重资料性工作的整理与研究，并对此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文明碎片》一书则再次呈现了两位专家在史料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深厚功底与学术积累。

《文明碎片》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共分4章，附录1。第一章古城址：汇编东北地区的辽、契丹古城址467条，东北地区的金、女真古城址170条，两个专题共汇编古城址637个条目。第二章墓葬址：分中国东北地区的辽、契丹墓葬址221条，东北地区的金、女真墓葬址44条，共265个条目。第三章辽金古塔，计44个条目。第四章其他遗迹：分中国东北地区的辽、契丹其他遗迹68条和东北地区的金、女真其他遗迹34条，共计102个条目。附录为《中国东北地区部分辽墓一览表》。

下卷为《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物》，共分8章，附录1。第一章官印：汇编中国东北地区辽、契丹官印14条，东北地区金、女真官印150条，共计164条。第二章碑刻类：其中中国东北地区辽、契丹碑刻分为经幢（5条）、墓碑、墓志铭（61条）和其他碑刻、题记（14条）三个专题；中国东北地区金、女真碑刻分为经幢（7条）、墓碑、墓志铭（7条）和其他碑刻、题记（10条）三个专题。共辑录各类碑刻104个条目。第三章铜镜：中国东北地区辽、契丹铜镜专题编辑条目24条；中国东北地区金、女真铜镜专题编辑条目47条。共计71条。第四章货币：主要辑录对象为中国东北地区辽金时期的银币、银铤、元宝和窖藏铜钱，共34个条目。第五章辽金壁画：主要为墓葬壁画，共26个条目。第六章陶瓷类：以墓葬出土陶瓷为主。其中中国东北地区辽、契丹陶瓷122条，中国东北地区金、女真陶瓷26条，共148条。第七章金银器：以墓葬出土金银器为主，以墓葬为单位编辑金银器条目。其中，中国东北地区辽、契丹金银器专题31条，中国东北地区金、女真金银器专题6条。第八章铜器：以墓葬出土铜器为主要收录对象，同样以墓葬为单位编辑铜器条目，计59条。其中，中国东北地区辽、契丹铜器汇编42条，中国东北地区金、女真铜器汇编17条。下卷另附《中国东北地区金代官印简表》。

二、《文明碎片》一书的学术特色

《文明碎片》一书的副标题——《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准确、直观地言明了该书的主旨，同时也客观反映出该书在资料汇编方面所曾经历的浩繁与复杂。尽管该书在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上进行了区域性的设定，但所谓的中国东北仍然包括了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行政区划，以及内蒙古地区的东部四盟市这一广袤区域，而在这一区域内所遗存和出土的辽、金、契丹、女真遗迹与遗物，其数量是极为众多，种类也是极为庞杂的。因此，从该书汇编和研究的对象来看，其内容必然将包罗万象，换言之，该书的选题已然决定了该书内容的丰富性。显然，作为资料性的整理研究，内容愈加丰富，其汇编梳理的难度无疑也愈大。这种难度一方面在于资料搜集要尽可能的广泛与全面，另一方面则在于去繁为简，体现资料校讎的准确性，以及资料整理的条理性。《文明碎片》一书通过两位作者的辛勤梳理和独具匠心的体例规划，不仅克服了上述两大困难，而且使其成为全书重要的亮点与学术特色。

在资料搜集方面，《文明碎片》一书共检索参考有关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遗物的著作146部、论文760篇，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当然也正因如此，方便该书在资料性方面具备了深厚的积累。在编撰体例上，该书更加颇具匠心。如前所述，在广袤的中国东北境内，星罗棋布地留存着众多的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传世和出土的相关遗物更是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如何将这些遗迹遗物分门别类地加以编辑整理呢？编撰者首先分遗迹与遗物两大门类，各自成书上、下两卷，两卷主题十分明晰。其中，《遗迹卷》将辽、金、契丹、女真东北地区遗存最多的城址、墓葬、古塔遗迹分为三大类，分列三章，其他小宗遗址单列为“其他遗迹”一章。由此，可以一目了然辽、金、契丹、女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历史遗迹。《遗物卷》则通过对相关遗物

的归纳，分为官印、碑刻、铜镜、货币、壁画、陶瓷、金银器、铜器八个主要类别，分列八章。前五类（前五章），官印、碑刻、铜镜、货币、壁画是以遗物名称作为类别的划分。这五大类可以说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有关辽、金、契丹、女真遗物研究和关注的主要几类器物，出土和存世的数量众多，史料价值较高，在器物种类方面颇具代表性；后三类（后三章），陶瓷、金银器、铜器则是以遗物质地作为分类标准，但没有划分骨器、石器、木器等类型，这应当是编者的一种针对性的取舍，因为陶瓷、金银器、铜器三类基本涵盖了有关辽、金、契丹、女真遗物的大宗，相关遗物相较于小宗的骨器、石器、木器等遗物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更具有契丹、女真的民族特点。尽管如此，陶瓷、金银器、铜器三类所包括的具体器物也是品种繁多的。仅以陶瓷类为例，从器型学上一般可分为碗、盘、碟、壶、瓶、杯、钵、盆、罐，等等，如将其进一步细分还各有明细。如果按照这种惯有思维进行分类汇编，其工作量之大堪称百科全书了。那么如何突破这种局限呢？《文明碎片》在此方面则为学界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它以墓葬为单位分别编辑陶瓷类、金银器类和铜器类的条目，这样既明确了相关器物的出土地点，有效的规避了器物分类方面的繁杂，而且也更多的保留了资料的原始性。当然，这种以墓葬出土遗物作为主要辑录对象，势必遗漏一些传世遗物和一些保存在私人藏家手中以及深藏于文博单位库房之中的历史遗物。不过这是客观存在的疑难问题，而非普通历史或考古研究者所能触及的。文物数量的众多和存世的多样性，决定了文物资料汇编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即便是该书以墓葬为单位的编辑对象，也是截止于书稿最初成稿的2005年之前所发掘的墓葬中出土的遗物，对于其后所出土的遗物和将来可能出土的遗物同样是不可能预先辑录的。

三、《文明碎片》一书的学术意义

通过上述对《文明碎片》一书的基本内容与学术特色的介绍与分析，该书的学术价值其实已然不言而喻了。除此之外，该书的选题立意于对辽、金、契丹、女真考古材料的汇编与考证，这一选题本身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历史文化的研究而言就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众所周知，辽、金王朝是由肇兴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族建立的两大帝国王朝。史学界经常把这两个曾称雄于东北亚地区的辽、金政权并称为“辽金”王朝。对于这两个王朝历史以及契丹、女真历史的研究早已成为国际显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辽、金、契丹、女真的历史文献存世极为有限，而在有限的文献中又时有讹误，虽然很多专家学者利用文献学的方法长期致力于对相关史料的校雠和补充，但是文献资料的匮乏已经成为掣肘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的主要因素之一。应对这种局面和困扰，与辽、金、契丹、女真相关的考古资料则越来越受到辽金史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的考古资料已经成为考订文献、还原探究辽、金、契丹、女真历史的重要佐证。

中国东北地区是契丹、女真及其所建立的辽、金王朝的肇兴之地。辽王朝的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以及其所辖的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均设在这一地区。金王朝的上京会宁府、北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以及上京路、蒲峪路、临潢府路、咸平路、胡里改路等也均设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因此，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曾遍布辽、金两朝以及契丹、女真族的皇家园林、皇宫、行宫、陵寝、墓葬、都市、城镇、寺院等历史遗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在以黑龙江流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辽河流域、大、小凌河五大流域文明为代表的东北大地上，均发现和出土了大量的辽、金、契丹、女真的历史遗迹与遗物。“中国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朝与契丹、女真的历史遗迹与遗物，几乎是中国东北地区其他王朝、王国政权出土和发现的历史遗迹、遗物的总和。”^[1]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东北地区属于辽、金、契丹、女真时期的各种古城就发现了700余座，官印500多方、古塔200余座、寺庙100余座，辽金碑刻300余通、铜镜600余面、墓葬200余座。”^[2]如此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遗迹、遗物，不仅反映了辽、金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繁荣和文明程度，更是今天我们研究辽、金、契丹、女真历史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对这些资料的

整合、汇编、梳理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历史的研究而言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这一特殊的学术背景可以说既是《文明碎片》一书编撰、出版的动因与机遇，同时也凸显了该书的重要意义。而在此背景之下，《文明碎片》以中国东北地区为研究视阈而开展的基础研究，通过系统、客观、详实、丰富的资料整理与考订，也实实在在地为有关中国东北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的深入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在此，我们不妨先简略回顾一下辽金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界有关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两大类。个案研究者，一般以某个历史遗迹或某个器物作为研究对象，其成果有的是以著作的形式公开出版，有的则是论文的形式发表于各种期刊或汇编于各种论文集之中。其中，遗迹研究多以考古发掘报告居多。这些成果虽然很大程度上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具有第一手价值的宝贵资料，但十分分散。综合研究者，主要以某一系列或同一类别的遗迹或遗物作为研究对象。就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而言，个案研究更为具象，综合研究则更加系统。两者均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本无可厚非各自的学术价值，但是以往有关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的区域性综合研究成果较少，以中国东北地区作为宏观视阈的研究则更为薄弱。究其原因，相关资料的过于零散应当是主要因素之一。因为如果对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的某一系列的遗迹或遗物进行系统性研究，势必需要充分地掌握有关的资料，而这些资料的检索、筛选、分类、汇总过程本身便是一个十分细致和复杂的工作。在资料获取方面的困难，无疑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开展和深入，而这种资料整理方面的空白，使得《文明碎片》一书为学界开展东北区域内的辽、金、契丹、女真的遗址遗物的综合系统研究搭建了便利的阶梯。

总而言之，《文明碎片》一书堪称对我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考古工作所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与总结，其参阅资料之丰富，编辑考订之精当，既凝结了两位作者的智慧与心血，也凝聚了数十年来从事辽、金、契丹、女真考古、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辛勤与汗水，而那些散落于东北大地上的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犹如穿越时空的文明碎片，承载着对辽金王朝的追忆和契丹、女真民族历史的往昔。因此，该书以“文明碎片”作为全书主旨的凝练实在是恰如其分。

注释：

[1] [2] 王禹浪、都永浩：《文明碎片——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2月。

[责任编辑：闫立新]